

文本关系中的诗意

——论苏轼诗歌中的“异时文本组”

姚 华

【摘要】苏轼诗歌中有自觉接续、呼应自我旧作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在诗中提及以往作品、引用旧日诗句、以“次韵自作诗”的形式追和旧作或是前后诗歌所表达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承递关系等。这些创作于不同时期、相互之间具有一定关联、宜联系在一起阅读的文本,或可称为“异时文本组”。“异时文本组”之间具有表意上的重复、变化与差异、在并置合观中泯灭差异等不同的文本关系,需通过对前后作品的比照、共读,在互文性关系中理解诗意。苏轼诗歌中的这一现象显示出诗歌写作与诗人个体人生的关联愈加紧密,诗人将自我的过去作为理解、体认当下的“前视域”,将时间维度纳入对眼前事物的观照,使诗歌写作具有保存乃至塑造个体历史的功能。记录过去的文字成为一种新的抒情媒介,背后反映出中唐至宋代诗歌发展的一条潜在脉络:在时代环境、写作传统之外,自我的旧日书写也逐渐成为诗情的土壤,滋养着诗意的生成。

【关键词】苏轼;异时文本组;自我互文;个体诗史

【作者简介】姚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原文出处】《文学评论》(京),2023.5.206~21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唐宋转型视野下宋诗谐戏写作的文化内涵研究”(18CZW02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学者指出,宋诗具有“日记体”式的写作特点^[1]。诗歌与诗人的个体生活贴合紧密,通过对诗歌的“编年”排列,可以展现诗人的一生,包括人生中不同的阶段、重大或微小的时刻。诗歌写作在此意义上具有了表现“个体诗史”的功能,这一特点由杜诗发端,在苏轼之诗中则体现得尤为鲜明^[2]。学者已从诗集编纂^[3]、制题艺术^[4]、“日记体”写作^[5]等角度论述了苏诗对“诗史”的体现。除此之外,似少有其他讨论。笔者认为,诗歌写作与个体人生的紧密关联带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诗人不同时期的作品看似为各自独立的文本,但却可能潜在地具有一种时间性的联系。正如人生的不同阶段无法完全割裂开来,“现在”总是包含着对“过去”的回忆、延续与变化——记录人生的诗歌也是如此,书写当下的诗歌与过去的诗歌之间也可能存在征引、接续、呼应等关系,不能完全割裂开来理解。本文试将这一类作于不同时期、相互之间具有一定关

联、宜联系在一起阅读的文本称为“异时文本组”。“异时文本组”与传统的组诗不同。组诗多为同题之作,诗歌编集时往往编排在一起,相互之间的联系较容易被注意到。“异时文本组”则诗题不同、写作时间不一,一般不会被特意排列在一起,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便较为隐秘。本文试对苏轼诗歌中的这类“异时文本组”予以阐发,意在将同一作者不同时期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纳入阅读诗歌的视野,在此基础上思考时间之流中的诗歌写作对于保存、呈现乃至塑造个体历史的意义。

一 异时文本组:层累式的诗歌书写

苏轼一生留下了两千余首诗作。在跨越了漫长时段的写作中,往日的诗作常常出现在当下的诗歌中,今、昔作品之间具有形式或内容上的某些联系。

苏轼会有意识地在诗中提及以往的作品,呈现出“诗中有诗”的写作现象。如其在赠予刘攽的诗中称“去年送刘郎,醉语已惊众”^[6]，“醉语”指去年所作

《送刘攽倅海陵》一诗^[7]。在送乔太博知钦州的诗中,苏轼称“今年果起故将军,幽梦清诗信有神”^[8],有如神算的“清诗”即指往日所作的《铁沟行赠乔太博》,因诗中曾有“明年定起故将军”^[9]的预言。除了直接提及旧作,苏轼还常在诗中引用往日作品中的特定表达,即《碧溪诗话》所谓“用自己诗为故事”^[10]的现象。如其称“吾诗固云尔,可使食无肉”^[11],用到旧日诗中“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12]的名句。笔者曾将“用自己诗为故事”视为苏轼诗歌“私典”的一种类型予以讨论^[13],除了语境的私人化,在援引旧作的写作形式中还包含着对往日经验的追忆、延续和比照,其诗歌功能仍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对往日旧作的自觉呼应意识,还体现在“次韵自作诗”的写作上。次韵诗一般是对他人诗歌的唱和,具有社交的功能。苏轼则对“次韵”写作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在交游唱酬之外,还有以“和陶诗”为代表的次韵古人诗,以及追和自己往日作品的“次韵自作诗”。学界已有一些关于苏轼“次韵自作诗”的研究,据统计,苏轼集中的这类作品共有87首,时间跨度相当之长,遍及其人生的各个阶段^[14]。频繁的书写意味着这是苏轼自觉运用的一种写作方式,即有意以“次韵”形式,强调前后文本跨越时间的联系性。共用同一韵脚字的诗歌常常在内容上具有明显关联,如旧地再游^[15]、故人重逢^[16]、同一事件的前后对照^[17]等。以次韵的形式书写这些经历,体现出苏轼有意呼应往日的写作、在变化对照的关系中体认当下的书写意识。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后出之诗并未直接提及之前的诗句,前后诗歌也无次韵等形式联系,但在所表达的内容上具有一定的相承或呼应关系。如有学者注意到,苏轼部分“日记体”诗具有明显的前后联系,有些诗从诗题即可看出所记事件的承接关系,诸如《游金山寺》与《自金山放船至焦山》《冬至日独游吉祥寺》与《后十余日复至》等,前后事件接续发生,彼此关联^[18]。此外,有些作品之间具有更大的时间跨度,但所书写的仍是相互关联的主题。例如任杭州通判时期,苏轼曾于熙宁五年至六年间三次过蜀僧文长老院,因每次所见文长老的状态不同,分别写下

《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夜至永乐文长老院,文时卧病退院》《过永乐文长老已卒》三首诗。后出之诗虽未直接提及之前的写作,但在表达上具有一定的互文性(详见后文分析),最末首诗中“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19]的喟叹亦建立在之前写作的基础上,将三首诗作为整体阅读,有助于加深对诗意内涵的理解。再如过淮河时,苏轼常会留下诗作,有意识地计算自己“过淮”的次数,由此构成一个数字不断增长的文本序列:“好在长淮水,十年三往来”^[20]“吾生七往来,送老海上城”^[21]“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22]。由“三”至“七”至“十”,不断增加的数字使这些文本之间具有一种意义上的相承与联系,以文本组的形式呈现出诗人“终老江湖”的宿命感与必然性。

以上所举各例构成了苏轼诗歌中形式各异的异时文本组。诗歌之外,在其他文体中也能见到苏轼有意呼应自我旧作的创作现象。例如“次韵自作”的行为在苏轼的词中也能看到^[23]。又如苏轼好写作“后”体,诸如《后赤壁赋》《后怪石供》等,皆是对自己之前写作的补充。这种前、后相续的写作意识显示出:苏轼会不断返回自己的旧作,在以往表达的基础上生成、书写新的经验与感受。这使苏轼的作品体现出一种“层累式”的书写特点,即伴随诗人人生经历的增长,诗歌写作也会在往日书写的基础上重复、叠加与变化。这样的层累式写作可以将数量较多的一系列文本联系在一起,形成意义相互关联的“文本群”。例如黄州时期的苏轼有一组非常著名的作品:《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元丰四年、五年、六年,连续三年的正月二十日,苏轼皆赴同一地寻春,并以自和前韵的形式写下这一组“次韵自作诗”,诗歌所表达的意义在反复书写中变化与累加,这一点后文还会详述。而在第一首诗中出现的“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24]之句,既是对前一年赴黄州途中所作《梅花》二首的呼应,又以“用自己诗为故事”的形式,在苏轼晚年谪贬惠州时的书写

中再次出现：“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25]以“梅花”这一主题为联系，两次贬谪经历遥相呼应，黄州和惠州的一系列书写之间形成了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的文本联系。

异时文本组具有“层累式”的书写特点，后出文本的表达乃是建立在之前写作的基础上，往日书写的符号、情境与意义会进入后出之作中。阅读这些作品，便需如“知识考古”一般，对诗歌的意义生成进行逐层还原，在文本的互文性关系中理解“文本组”的表达形式所具有的特殊诗意。

二、自我互文：文本关系与诗意的生成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盖指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文本间性”。这一概念自法国学者茱莉娅·克里斯蒂娃提出后，早已成为当代学界极为重要的文本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文本分析领域。中国古典诗歌的互文性亦受到不少关注^[26]，但相关研究所讨论的多为不同作者文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作品与其先前文学传统之间的关联。然而在一个作家自己的作品内部同样存在着广泛的互文现象，这样一种“自我互文”又具有怎样的文学意义？已有研究似少有讨论。异时文本组区别于独立作品的特殊诗意，便是在前后文本的互文关系中体现的。具体而言，又可表现为重复、变化与差异、在并置观照中泯灭差异等不同的互文形态。

1. 重复

异时书写之间具有联系性，盖因前后文本往往涉及相同的诗歌对象，诸如人、事、物等。与之相关最为直接的互文表现便是诗歌元素的重复。次韵自作诗分享了相同的韵脚字，此不必提。此外，后出文本还会延续前文本中的某些表达，以语言符号的重复显示出文本之间的关联。

前文本中某些具有标志性的诗歌符号，往往代表着一段特定的经历。当类似情境复现时，相关符号便也会再次出现。例如元祐四年再次赴杭的苏轼曾如此描述重游西湖的感受：“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27]句中的“跳珠”二字即是对熙宁年间倅杭时所作诗句“白雨跳珠乱入船”^[28]的沿袭，故非泛泛形容，而是对雨中醉游西湖这一特定经历的

指代。又如晚年被贬惠州时，苏轼曾自酿“真一酒”并有诗句称：“拨雪披云得乳泓，蜜蜂又欲醉先生。”^[29]以“蜜蜂醉先生”的拟人想象描述酿酒行为，这一表达方式非常特殊，其实是对黄州时自酿蜜酒所作诗句“君不见南园采花蜂似雨，天教酿酒醉先生”^[30]的化引与重述。酒之风味的相似借由语言的重复体现了出来。“蜜蜂醉人”是诗人个性化的想象，使黄州所酿蜜酒有别于其他的酿酒经验，因而能勾连起特定的回忆。在以上诗句中，过往的经历被凝化为特殊的诗歌符号，苏轼以诗歌元素的重复表现往事的再现。

除了指代特定经历，诗歌元素的重复还常发生在苏轼与同一交往对象的诗歌酬赠中，以此表现特定情感的延续与深化。关于这一点，朱刚在解读苏轼《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时曾有敏锐的分析^[31]。类似的情形并不鲜见，例如“夜雨对床”之约便在苏轼、苏辙的酬赠之诗中被反复表达，构成承载了私人情感记忆的著名“私典”^[32]。再如苏轼在《赠王子直秀才》诗中称“幅巾我欲相随去”^[33]。一年后重逢，苏轼作诗称“解舟又欲携君去”^[34]，《东坡诗集注》引《晋书·张翰传》中张翰欲载舟随贺循同去之事注此句^[35]，然而张翰与贺循“初不相识”，此典情境与苏轼和王子直的关系并不相契。其实从“又欲”的用词即可看出，此句是对前诗中既有表达的呼应，苏轼延续了前一首诗中与王子直关于“归去”的对话，这一心愿是贯穿前后两首诗的潜在主题。相似的还有《留别金山宝觉、圆通二长老》诗以“风流二老长还往，顾我归期尚渺茫”^[36]结句，五年后苏轼又作诗赠宝觉禅师，末句称“稽首愿师怜久客，直将归路指茫茫”^[37]。对“归处”的搜求探寻亦是五年间未变的主题，诗意的重复凸显了苏轼为“客”之久，亦强化了“归去”之愿的执着、深切。在以上这些诗例中，后出之诗皆以重复表述的形式延续旧日约定，强化内心之愿，形成与友人之间跨越时间的反复交流。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诗歌符号的重复，前文本中的相关表达语境会一并进入后出文本之中，生成丰富的“言外之意”。苏轼与友人间能凭借有限的语言形成丰富的交流，亦是由此实现。例如苏轼送王

定国通判扬州诗中有“未许相如还蜀道,空教何逊在扬州”^[38]一句,以“何逊扬州”之典描述王定国倅扬,又以司马相如自比,表达为仕宦所误、无法回到蜀地故乡的遗憾。未许“归去”的感叹与“何逊扬州”句同时出现,构成这一表达的特殊语境。而在之后所作诗中,苏轼复用此典称:“何逊扬州又几年,官梅诗兴故依然。”^[39]施注云:“是时定国始得宿州,宿隶淮东。”^[40]此句沿用旧语,乃是描述王定国将赴宿州为官一事,本与苏轼自己无关。但伴随着“何逊扬州”这一表达的重复,前首诗中“空教”的情感态度、苏轼对自己始终无法退归的感叹,皆凭借语境的互文成为后一首诗并未直接言明的情感背景。因而此诗后半称“卜筑君方淮上郡,归心我已剑南川。此身正似蚕将老,更尽春光一再眠”,诗意终落在“归蜀”心愿上,延续了前诗的情感主题;“一再眠”的“一再”之叹也需联系前诗才有着落。语境的互文将之前诗歌中的相关表达带入后出诗歌中,使诗歌在相对较为有限的文本容量之外具有了更多的联想空间与意义可能,诗歌的表意空间借此得到扩展与丰富。

重复性的诗歌元素构成互文性表达的基础,然而正如“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在重复性的经验中总是包含着不同。这就带来异时文本组的另一种互文关系:变化与差异。

2. 变化与差异

伴随着人生经验的变化,重复性的诗歌元素也会在反复书写中发生变形,以此呈现诗人经历与感受的发展与改变。例如前文提到,苏轼曾三过永乐文长老院并作诗,三首诗除了内容相承,在诗歌符号的使用上也有互文之处。而随着文长老由“生”至“病”至“死”,诗歌符号也在重复中发生了变形。例如在《夜至永乐文长老院,文时卧病退院》一诗中,苏轼以“惟有孤栖旧时鹤,举头见客似长言”^[41]句结尾。僧人寺院中多养鹤,故与“旧时鹤”的重逢意味着旧地重游。之后再过此地,文长老已卒,苏轼又作一诗,起句便称:“初惊鹤瘦不可识,旋觉云归无处寻。”^[42]“鹤”的意象再次出现,与前诗互文。然而曾经相熟的“旧鹤”如今却“瘦不可识”,如此巨大的变

化未必是对眼前景象的实写,苏轼是借“鹤”这一符号的变形书写人事的变迁,暗寓对文长老的存殁之叹。“鹤”意象的前后延续形成一种类似“顶针”的效果,将异时所作的两首诗联系在了一起。而同一诗歌元素的变形,也凸显了前后诗歌内容上的变化与差异。

苏轼于黄州连续三年正月二十日写下的三首诗作也具有明显的互文关系。三首诗如下:

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稍闻决决流冰谷,尽放青青没烧痕。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43]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酹,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44]

乱山环合水侵门,身在淮南尽处村。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岂惟见惯沙鸥熟,已觉来多钓石温。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45]

在这组诗中出现了大量重复性的诗歌元素,将跨越三年的三个文本细密地交织在一起。如第一首诗“半瓶浊酒待君温”句与第二首诗“江城白酒三杯酹”句皆提及“酒”;第一首诗的“细雨梅花正断魂”句与第三首诗的“暗香先返玉梅魂”句皆含有“梅”;第二首诗的“东风未肯入东门”句与第三首诗的“长与东风约今日”句皆出现“东风”等。相同诗歌元素的重复与回环像隐秘的丝线般将三首诗串联、编织在一起。这些元素如此自然地出现在每首诗的表达中,完全可以被独立地阅读。但若将互文关系纳入观照视野,则又能增添对诗歌意义的理解。事实上,诗中的重复性元素在前后书写中已悄然发生了变化,暗示了诗人每年出门寻春状态的不同。如在第一首诗“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一句里,“半瓶浊酒”与“数亩荒园”对应,所写的是黄州物质上的贫瘠与环境的荒凉。但在第二年诗中“江城白酒三杯酹,野老苍颜一笑温”一句里,荒城“浊酒”已然变得甜美宜人,温暖一如黄州父老的笑颜。类似的转变贯穿三首诗,如第一首诗中“未肯入东门”的东风,在最后一首诗中成为了与诗人心意相通的朋友,故能

“长与东风约今日”；第一首诗中无限荒凉的“数亩荒园”，在第三首诗中转变为可以终老的“五亩”之宅，是能够安顿归去之愿的家园；而在第一首诗中令人断魂的“梅花”，最终也成为了“暗香先返”、向人报送春天信息的积极象征。这些互文元素在前后文本中的变化，无一不显示出诗人对黄州生活的逐渐接纳态度。时日未变，黄州的春天却似一年比一年更为温暖。诗歌符号的重复与变形如同音乐主题的再现与变奏，留下诗人心态转变的线索与痕迹。

而在另一些异时文本组中，前后诗歌呈现出更为鲜明的对照与反差，在互文关系中凸显了彼此的差异。在对次韵自作诗的研究中，内山精也即指出，“次韵自作”的写作形式具有使“对比明确化”的作用：“因为诗题中记有‘用前韵’，故读者自然会去寻找韵字相同的原作，将两者对照体会。由于原作跟次韵诗之间，其同样的字数、同样的句数、同样的韵字等完全相同的样式已经得到保证，所以两者的差异就会显得极为明确。”^[46]凭借相同诗歌元素建立起的联系反而更为凸显了前后文本其他方面的反差。这类写作在诸如乌台诗案前后、苏轼晚年南迁与北归的书写中体现得最为鲜明。将前后文本对照、比较，确实能非常直观地看到苏轼生存处境、内心状态的不同。如以下这组诗：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静。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47]

秋风卷黄落，朝雨洗绿净。人贪归路好，节近中原正。下岭独徐行，艰险未敢忘。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48]

两首诗一作于苏轼贬谪岭南途中过大庾岭时，一作于自儋州北归复过大庾岭之日。两首诗所用韵脚字相同，但前后表达在很多层面都形成了显著的意义对比。苏轼以大庾岭为界，塑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诗歌空间：一是“身心洞清静”的清凉世界，一是有着“黄”“绿”等丰富色相的风雨人间；一是“身世永相忘”的无牵无挂，一为“艰险未敢忘”的耿耿于心；一是长生的“仙人”之境，一为由“叔孙子”“鲁诸生”

等组成的现实政治世界^[49]。有趣的是，南迁时苏轼是罪人身份，反欲以浩然之气超然世外；北归时苏轼大罪已赦，却对“中原”的“艰险”有着疑虑担忧，两种心境的截然不同在前后诗意的对比中呈现得极为鲜明。而在这样的差异中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与人生态度，亦凭借文本的互文对照得到了尤为突出的显示。

3. 并置合观：泯灭差异的整体观照

最后，在苏轼的异时文本组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互文关系：前后文本从不同角度表现同一事物或一个道理的不同部分，合而观之才见整体。前后诗意虽有差异，但在作为整体之一部分的表达作用上又并无分别——于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形成了“泯灭差异”的效果。这样一种由“并置合观”而“泯灭差异”的文本关系，尤能见出苏轼思想的独特性。

如苏轼曾连续写作《欧阳季默以油烟墨二丸见饷，各长寸许，戏作小诗》与《明日复以大鱼为馈，重二十斤，且求诗，故复戏之》两首诗：

书窗拾轻煤，佛帐扫余馥。辛勤破千夜，收此一寸玉。痴人畏老死，腐朽同草木。欲将东山松，湮尽南山竹。墨坚人苦脆，未用叹不足。且当注虫鱼，莫草三千牍。^[50]

汉廷九尺人，谁似老方朔。那将一寸金，令足三冬学。饷鱼欲自洗，鳞尾光卓犖。我是骑鲸手，聊堪充鹿角。^[51]

两首诗前后相承，诗意看似各自独立，实需并置合观，诚如查慎行对后一首诗的注说：“此诗上四句从前一首生来，合观二章，乃见作者之意。”^[52]苏轼以欧阳季默两次赠物一小一大的差别做文章开玩笑。前首诗称所赠之墨虽小，但人的生命更为有限，所以不必叹其不足：“墨坚人苦脆，未用叹不足”，这是因物之小而写其大。但在后首诗中，欧阳季默送来大鱼，苏轼却偏称对“骑鲸手”而言，鱼远不够大；昨天送来的那一寸墨，自然也不够装点诗人的学问了：“那将一寸金，令足三冬学”，这是因物之大而写其小。前一首诗的“未用叹不足”与后一首诗的“叹不足”看似截然矛盾，但两首诗表面所言都非诗人真正要表达的思想，苏轼要说的正是物之大与小、坚与脆等皆具

有相对性,不可执着于其表象。而擅长不断变换角度观察事物,正体现出苏轼思想的“转物”之妙。只有将这一组诗并置合观,看到前后表达的不一,才能更好地理解苏轼这一不为物之表象所滞的观物姿态。

事实上,苏轼的不少书写都呈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文本关系,即不同作品所描述的状态看似不同,但在更高的层面上却并无本质的分别。如其记录了文长老“老病死”的变化,但这三者并不是线性的发展,“死”并非生命的终点,三者都只是漫长轮回的一个片段、生命过程中一个短暂的瞬间,实无本质的差别。只有将三个文本并置合观,才能理解苏轼对生命的真正感受,即“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53]的态度。在诗歌之外的文体中也能看到这样的文本关系。比如著名的前后《赤壁赋》,两次游观,风景截然不同:“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54]然而,前、后赤壁虽风景不同,却仍是同一个赤壁,没有哪一个更加“真实”。只有将两篇文本并置合观,看到其中的风景之“变”,才能更深切地意识到事物“不实”之表象,即现实如“梦”的本质——这也正是《后赤壁赋》的主题。在以上这些写作中,文本之间具有一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关系,每个单一文本皆非“庐山真面目”,但又同是“庐山”的一部分。而“庐山”的面貌,只能在文本的相对关系中呈现。

要之,苏轼诗歌中的异时文本组具有多种不同的互文表现,需通过对前后作品的比照、共读,在文本的相互关系中理解诗意。而自我互文的书写形态,也体现出苏轼对个体历史的独特观照与表达。

三、时间之流中的诗歌:个体历史的保存与塑造

本文开头提到,苏轼的诗歌与其个体生活及人生轨迹贴合紧密。诗歌在时间之流中的渐次展开与前后映照,尤为凸显了诗人对过去与变化的关注意识,是诗人保存、塑造个体历史的一种特殊形式。

1. 个体生命中的“往事再现”

在异时文本组的书写中,“往事再现”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故人重逢、旧地重游、相同日

期的重复、相似经历的复现……是过去在当下的再现,引起了诗中旧日诗句的回响。对往事的记忆与回顾,构成了诗人观照当下的“前视野”。宇文所安在《追忆》一书中曾提出“中国古典文学的往事再现”这一著名命题,称“中国古典诗歌始终对往事这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敞开怀抱”^[55]。宇文所安所讨论的“追忆”主要为咏史、怀古等诗歌中的历史往事,属于诗人们的“集体记忆”;而在苏轼笔下,个体生命中的往事成为诗意生成的基础,得以为诗歌的世界“提供养料”。

这种对自我之过去的回望,显示出诗歌书写朝向更为日常化、个人化的方向转变。苏轼所重复追溯的往事,不乏一些十分琐碎的日常生活事件,诸如“跳珠乱入船”的风景、“蜜蜂醉先生”的甜蜜、“可使食无肉”的玩笑等,它们本身并无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对苏轼个人而言却具有回忆的价值。即便是晚年大罪初赦、从儋州北归时的写作中,引发苏轼追怀的也不全是“过大庾岭”这样的标志性事件,也有被取走的“壶中九华石”这类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56]。然而这些并不具有宏大意义与历史价值的事件,却有可能构成苏轼人生中的重要时刻、组成其精神世界、塑造诗人对于个体生命史的感受与认知。异时的诗歌追怀将这些微小的碎片从时间之流中打捞了出来,仅对诗人而言具有意义的过去,也由此在漫长的人生中浮现了出来。

“文学的写就伴随着对它自己现今和以往的回忆。它摸索并表达这些记忆,通过一系列的复述、追忆和重写将它们记载在文本中,这种工作造就了互文。”^[57]正如互文书写被认为是文本嵌入文学之历史的一种形式,“自我互文”也在对往事的回忆中,“通过一系列的复述、追忆和重写”,帮助诗人连接、进入“自我的历史”。

2. 时间体验的表达

异时文本组的写作形式还体现出,苏轼惯于将时间的维度纳入对眼前人、事、物、景的观照,在“过去”的基础上书写人生经验的变化,在前后文本的对照关系中呈现时间在万物之上的流逝。

苏轼诗中有着敏锐、丰富的时间体验与表达,

“回望与悬想”^[58]频繁出现在他的写作中。他的诗歌因此常具有清晰、丰富的时间层次。异时文本组便往往包含时间跨度极大的诗歌写作。例如在《留别金山宝觉、圆通二长老》与《余去金山五年而复至，次旧诗韵，赠宝觉长老》之间有五年岁月的流逝；两次赴杭所作诗歌之间有着近二十年的间隔；苏轼晚年从儋州北归时所作诗歌，则是对八年前南迁路上诗作的追和。这些诗歌中常常出现“高谭为洗五年忙”^[59]，“不见跳珠十五年”^[60]，“搔首凄凉十年事”^[61]等凸显时间流逝的表达。不同时期的写作提供了明确的时间标度，诗人以文本的互文关系，呈现人生经验的发展与变化。

而在具体的写作中，又能看到苏轼对待时间的独特姿态。时间的流逝容易带来对事物盛衰变迁的感慨与生命老去的忧思，这本是古典诗歌中经典的抒情内容。苏轼之诗虽不乏对世事变迁、故人存殁的慨叹，但对“盛衰”的抒情性感发并不十分强烈。苏轼借人事的今昔对比所表达的，往往是一种更为抽象的哲理，诸如：“万事如花不可期，余年似酒那禁泻。”^[62]“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63]“莫把存亡悲六客，已将地狱等天宫。”^[64]这与苏轼的哲学思想及人生态度相关。时间的流逝永不停息，然而正因事物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故不需执着于每一刻当下，因其终将逝去，无可留恋。甚至这一世的生命，在佛教的轮回世界观中，亦只是宏大变化中的一刹那，故而连生死都无需执着。苏轼屡屡表达这样一种不滞粘于当下、纵浪于时间之流中的人生态度：“我观去来今，未始一念留。”^[65]“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66]在此认识下，盛衰、荣辱、生死等对比性的状态虽有差异，但在更高的层面上，却皆为“变化”的一部分，彼此并无分别。苏轼的这一思想兼具道家“齐物”与佛教“平等观”的特点，通过取消事物之间的差别获得达观与超越。这样一种平等的观照弱化了苏轼诗中的情感喟叹，使其诗呈现出更强的哲理色彩。前文提及，异时文本组的写作中有一种在更高的层面“泯灭差异”的互文关系，背后的哲学思想亦与此相通。苏轼诗歌在记录时间体验的同时，显示出对

待时间变化的超然姿态。

3. 诗歌写作对个体记忆的塑造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异时文本组中，“往事再现”是以“文学再现”的方式呈现的。时间的流逝不会停止，在不断变化的时间之流中，苏轼以书写诗歌的方式截取时间的片断、定格“过去”。这一行为如其在《王中甫哀辞》中的描述：“堪笑东坡痴钝老，区区犹记刻舟痕。”^[67]此诗是对八年前所作《同年王中甫挽词》的自次韵之作，苏轼在题序中告诉我们，在两次写作相隔的八年间，有六位故人相继离去。苏轼自嘲记录这些的诗句如同画在时间之舟上的刻痕，小船早已走远，文字无法对抗时间。虽如此，苏轼仍一再地作诗，试图在时间之流中留下雪泥鸿爪般的印记。

诗歌写作无法留住时间，但却可以保存乃至塑造记忆。由过往诗句所标记出的事件能够成为日后回忆的内容，是因为诗歌写作赋予了它们意义。正如黄州时的苏轼在每年正月二十日作诗——这个日期如此平凡，但因为苏轼曾写下诗作，之后每一年的这一日，苏轼便有了回忆的对象。是时间之舟上的刻痕将这一日标记为苏轼人生中的“纪念日”^[68]。诗歌塑造了这些时刻，为平凡的日子赋予个人化的意义，使之成为诗人回顾往事时的参照。

与此同时，诗歌写作也塑造了诗人对过往的记忆方式。当诗人以征引旧作的形式再现往事时，往事已然经过了语言的加工，被特定的文学符号所定型。如任密州知州时苏轼曾作《后杞菊赋》，自嘲密州物质贫瘠、“斋厨索然”，只能以杞菊为食^[69]。密州当然并非真的没有其他食物，但在诗人之后的追忆中，“采杞”“食菊”便成为这段生活的指代：“我昔在东武，吏方谨新书……采杞聊自诳，食菊不敢余。”^[70]“躬持牛酒劳行役，无复杞菊嘲寒慙。”^[71]对密州的记忆与“杞菊”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正如“跳珠”只是西湖之雨的样子，“梅花”已成黄州流寓生涯的象征，苏轼用诗歌的语言对生活进行意象化的提炼，复杂的生命体验被浓缩为象征性的符号与细节。“记忆在经过语言的组织以后，会生成新的意义，这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认识。”^[72]诗歌是雕刻时光的工

具,赋予记忆以具体的形态。在反复的文学书写中所延续的,是经过讲述的过去,即一种已然文学化了的人生经验。

旧日文本保存与再现的可能性,则构成了记忆往事、征引旧文、追和前作的物质性基础。假若总是“坏壁无由见旧题”^[73],仅靠记忆追述前作便显得困难。正是对自己往日写作的整理、保存与回顾意识,包括诗集的编纂、诗歌自注、对自己作品的题跋等行为,带来了诗人与“旧作”不断重逢的可能性。苏轼也曾屡次提及“阅旧诗卷”^[74]“举旧诗”^[75]等行为,这使跨时的追和、征引成为可能。在这些跨越时间的书写中,诗歌成为了时光的标尺与回忆的容器,以文本的物质形态,在时间之流中建起一个个小小的“纪念碑”。

结语

本文以苏轼诗歌为对象,尝试提出“异时文本组”的概念,指出在苏轼的诗作中有一些跨越时间的文本联系,对这些作品的阅读应由“单一文本”转为对“文本群”的观照,在互文关系中理解诗歌的书写方式与意义生成。这一现象显示出诗歌写作与诗人个体人生愈加紧密的关联,诗人将自我的过去作为理解、体认当下的“前视域”,将时间维度纳入对眼前事物的观照,使诗歌写作具有保存乃至塑造个体历史的功能。诗歌所记录的往事宛如投入水中的石子,不只在当下发出声音,还会在漫长的人生中泛起涟漪、产生回响。对这些诗作的解读,便需结合诗人整体写作的宏观语境展开。

需要指出的是,对往日旧作的回望与呼应并非苏轼所独有的写作现象,而应视作唐宋诗歌发展中一种趋势的体现。一方面,自我的过去成为中唐至宋代诗歌书写中逐渐重要的一个“抒情母题”,例如白居易对长安生活的回忆^[76]、梅尧臣与欧阳修诗歌中的“少年洛阳”^[77]、陆游的“绍兴记忆”^[78]等,自我的过往成为诗歌的抒情底色,一再出现在唐宋诗人的书写中。另一方面,伴随诗歌写作与日常生活的紧密结合,自我的过去常常以旧日诗作的形式留存在诗人的记忆里,成为诗人追忆与引用的对象。换言之,诗人的人生体验乃是经过了文学性的转化,以

“文本”的形态在诗歌书写中延续。这些方面,中唐诗人白居易和苏轼的诸多共同点尤其值得注意。无论是用诗歌纪年的写作倾向,还是“用自己诗为故事”的写作形式,苏轼和白居易都有很强的相似性,这一点也为不少诗话所指出^[79]。而学者在评述白居易诗歌的自注时曾有如下发现:“这些自注显示出,在诗歌写作中不断地回想并引用自己的旧作,的确是白居易创作中一个突出的现象。”“自己的诗歌所赋形过的昔日生活情感成为一己之情的组成部分,他的诗情因此扩大了自己的领域。对诗歌史来说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发展。”^[80]记录过去的旧日文字成为一种新的抒情媒介,文学表达替代直接的现实经验,以互文的形式进入了之后的写作。苏轼诗歌继承并扩大了白居易诗中这一“诗情的领域”,这或许能勾勒出诗歌发展的一条潜在脉络:在时代环境、写作传统之外,自我的旧日书写也逐渐成为了诗情的土壤,滋养着诗意的生成。

参考文献:

- [1]马东瑶:《论宋代的日记体诗》,《文学遗产》2018年第3期。
- [2]谢思伟《论自传诗人杜甫——兼论中国和西方的自传诗传统》(《文学遗产》1990年第3期)提及个人与历史之结合形成了杜甫自传诗的诗性,刘宁《杜甫五古的艺术格局与杜甫“诗史”品质》(《文学遗产》2009年第3期)亦称杜甫“深入地开拓了以‘一人之诗’表现‘一代之史’的艺术可能”,朱刚则在《苏轼十讲》中明确提出“个体诗史”这一概念,称“相比于杜诗,苏轼的‘诗史’是更为个体化的。”参见朱刚《苏轼十讲》,第422—423页,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
- [3]浅见洋二:《文学的历史学——论宋代的诗人年谱、编年诗文集及“诗史”说》,《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金程宇、冈田千穗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 [4]姜双双:《论苏轼诗题的叙记性》,《中国韵文学刊》2018年第1期;朱刚:《“诗史”观念与苏轼的诗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 [5]陈筱烨:《宋代“诗史”观下的“日记体诗”创作——以苏轼为例》,《惠州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 [6][8][9][11][12][19][20][21][22][24][25][27][28][29][30][33][34][36][37][38][39][40][41][42][43][44][45][47][48][50][51][53][59][60][61][62][63][64][65][66][67][70][71][73][74][75]苏轼撰,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295页,第682页,第

602 页,第 1523 页,第 448 页,第 566—567 页,第 940 页,第 1373 页,第 1870 页,第 1078 页,第 2075 页,第 1647 页,第 340 页,第 2124 页,第 1116 页,第 2118 页,第 2448 页,第 552 页,第 943 页,第 1535 页,第 1612 页,第 1612 页,第 529 页,第 566 页,第 1078 页,第 1105 页,第 1154—1155 页,第 2057 页,第 2425 页,第 1809 页,第 1810 页,第 2363 页,第 943 页,第 1647 页,第 2301 页,第 1033 页,第 1105 页,第 1115 页,第 1906 页,第 892 页,第 1282 页,第 1801 页,第 1382 页,第 97 页,第 1766 页,第 2455 页,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7]《送刘放倅海陵》中有“莫夸舌在齿牙牢,是中惟可饮醇酒。读书不用多,作诗不须工,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莱宫”等语,故称“醉语已惊众”。

[10]黄彻:《碧溪诗话》,第 67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13][32]姚华:《“私典”及其诗学转型意义:以苏轼诗歌为中心》,《文学遗产》2021 年第 5 期。

[14]参见内山精也《苏轼次韵诗考》,《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朱刚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吴海《浅析苏轼次韵自作诗的“主体”性特点》,《文教资料》2011 年 12 月号下旬刊。

[15]诸如《留别零泉》与《再过常山和昔年留别诗》。

[16]诸如《赠王子直秀才》与《王子直去岁送子由北归,往返百舍,今又相逢赣上,戏用旧韵,作诗留别》。

[17]诸如《壶中九华诗》与《予昔作〈壶中九华〉诗,其后八年,复过湖口,则石已为好事者取去,乃和前韵以自解云》。

[18]马东瑶《论宋代的日记体诗》、朱刚《“诗史”观念与苏轼的诗题》、姜双双《论苏轼诗题的叙记性》等文皆提及此类现象。

[23]参见内山精也《苏轼次韵词考——以诗词间所呈现的次韵之异同为中心》,《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

[26]参见焦亚东《中国古典诗歌的互文性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2018 年版。

[31]苏轼在之前所作《送芝上人游庐山》诗中有“老芝如云月,炯炯时一出”的比喻,又在《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中称“但愿老师真似月”。此句有“真似月”与“心似月”的异文,朱刚以“真似月”为佳,称:“‘心似月’可以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比喻,而‘真似月’则表明已不是第一次,这是很重要的差别。在苏轼父子与法芝之间,这个比喻被反复使用,其喻义为双方所知晓,且不断地加深领会和沟通。借助于这个简单的意象,他们可以达成更为复杂曲折的交

流。”朱刚:《苏轼十讲》,第 4 页。

[35]《晋书·张翰传》:“会稽贺循赴命入洛,经吴阊门,于船中弹琴。翰初不相识,乃就循言谈,便大相钦悦。问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载即去,而不告家人。”房玄龄等:《晋书》,第 2384 页,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46]内山精也:《苏轼次韵诗考》,《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第 342 页。

[49]此句典出《汉书·酈陆朱刘叔孙传》,盖指叔孙通招鲁诸生三十余人制礼仪,鲁有两生不肯行之事。含有对徽宗即位后新的政治形势的隐射,且表达了“不肯行”的政治态度。参见《苏轼诗集》所引注释(第 2425 页)。

[52]苏轼撰,查慎行补注,范道济点校:《苏诗补注》,第 1373 页,中华书局 2019 年版。

[54][69]苏轼撰,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 8 页,第 4 页,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55]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郑学勤译,第 3 页,三联书店 2014 年版。

[56]参见姚华《苏轼诗歌的“仇池石”意象探析》,《文学遗产》2016 年第 3 期。

[57]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第 35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58]宁雯《苏轼的自我认识与文学书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版)一书有多处述及苏轼诗歌中的“回望与悬想”,可参看。

[68]朱刚《“诗史”观念与苏轼的诗题》称诗题中的这些日子具有“纪念日”的性质。

[72]茱莉娅·克里斯蒂娃:《主体·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祝克懿、黄蓓编译,第 42—43 页,三联书店 2016 年版。

[76]李丹婕:《白居易笔下的元宗简——兼谈长安东南隅与中唐文人的交游空间》,《文献》2018 年第 2 期。

[77]王启玮:《洛阳少年与少年洛阳:梅尧臣、欧阳修西京书写的历时考察》,《弦诵集》,马东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78]程海伦:《论陆游的绍兴记忆——以个体境遇的私人化书写为视角》,《北京社会科学》2018 年第 7 期。

[79]如《容斋随笔》“白苏诗纪年岁”条即将白居易、苏轼并置比较,《碧溪诗话》“用自己诗为故事”条所举诗例也以白居易、苏轼诗为多。

[80]查正贤:《论自注所示白居易诗歌创作的若干特征与意义》,《文学遗产》2015 年第 2 期。